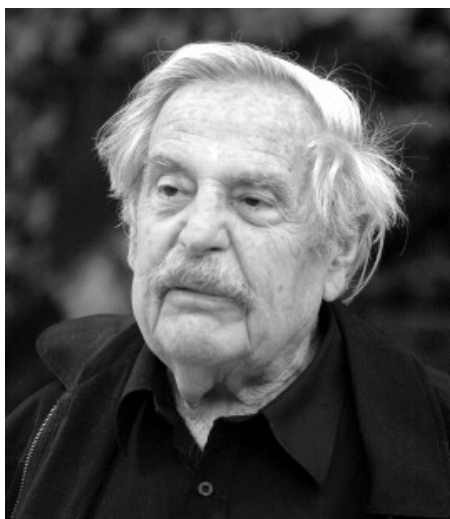


“艾赫曼审判”： 以色列文学重建大屠杀记忆的转折点

□钟志清



海姆·古里



哈努赫·巴拉夫

本土以色列人因此非但未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际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怀疑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期间的受难者身份,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表示怀疑。幸存者所提出的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同主流的政治话语产生了距离,在公共场合没有立足之地。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有意遗忘过去。

如何树立以色列的合法性,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成为当时以色列政府颇重视的重要问题。历史创伤被塑造或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即使有作家创作出反映集中营的作品,但读者非常有限。

审判中出庭的100多名证人,多数是承受恐惧和屈辱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审判促使以色列年轻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大量地送进焚尸炉。审判不仅使以色列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历史创伤,同时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建国期间根据国家利益创造的英雄主义幻象,开始对大屠杀期间“所有形式的反抗”均是英雄行为的说法表示认同。同时,审判也向世人表明,只有在拥有主权的国家中,犹太人才有能力将艾赫曼置于审判台。在强调民族统一与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审判还激励幸存者打破沉默,公开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过去。

描写大屠杀及其余响的希伯来语叙事文学也从此表现出民族集体记忆形式的转变,对待幸存者与亡亡者的态度亦开始更新。文学社团和许多作家对审判极其关注,并对种族灭绝的体验反映强烈。以色列本土作家海姆·古里(Haim Gouri)和哈努赫·巴拉夫(Hanoch Bartov)在审判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巧克力交易》(1965)和《特种部队》(1965)就是当时希伯来语叙事文学对民族创伤记忆的代表性呈现。

《巧克力交易》:再现犹太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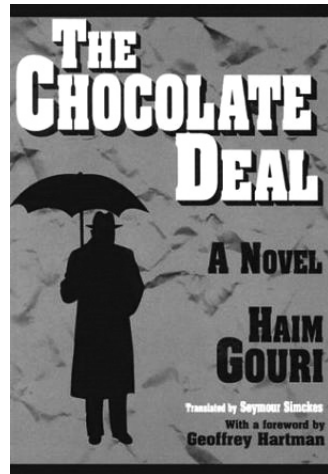
海姆·古里生于特拉维夫,1947年在欧洲帮助犹太幸存者偷渡到巴勒斯坦,同欧洲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于幸存者的态度,唤起了他对犹太历史的认同。在“艾赫曼审判”期间,他以记者身份旁听了审判,而后出版了著名的《面对玻璃亭》。在书中他表达了一个本土以色列人的负疚感,为什么对二战遭到屠杀的同胞无动于衷,为什么对回到以色列的幸存者表示怀疑。这一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道德反省和清醒认识,向大屠杀犹太英雄主义单调的陈词滥调做出了挑战,并改变了由以色列本土作家开创的文学叙事传统。他的第一部小说《巧克力交易》致力于一种艰难的尝试:通过深入 to 受害人的内心世界去揭示大屠杀的贻害。

《巧克力交易》的主人公是两个大屠杀幸存者:卢比和摩迪。他们是老朋友,分别在不同的集中营幸存下来,战后数月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火车站上偶遇。表面上看,月台上刚刚抵达的流浪者把犹太人的形象从大流散时代的“无处藏身”转变为在新的生存挑战下所面临的“无处立足”,反映出幸存者为在新环境中生存而努力时所面对的两难处境。同时,作者还试图表明幸存者多少残留着传统的性格、骄傲和希望,这些尽管已经被时间和痛苦极大地改变,但仍然象征着古老民族辉煌的过去和民族文化。在“那里”(战争期间欧洲)，“活着”是如此宝贵,而今“活着”却需要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新含义。通过表现两位主人公的不同经历和命运,古里进行着一种虚构的尝试,为原先“悲惨的灵魂”找到适应新世界的形式。卢比是个有雄心、有信心的实干家,非常渴望新的生活:

“我想做点什么。我不想总是让别人照顾,我不想总是在失踪者的名单中寻找自己。我想从这里跳跃到另一个所在,不断地移动改变,给他们看:我将活下去。”

为了证明个人生存的价值和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卢比积极地找寻他的亲属,设置重建自身的日程表。叔叔曾经是那座城市中一位德高望重而富有的律师,卢比希望后者能为他提供帮助。不幸的是,叔叔全家都被遣往死亡集中营。因此,第一道“拯救之门”实际上已经关闭。但他并未放弃,而且继续冲击。尤其是,他从烈火中救出了一个女孩的英勇举动表明一个曾经经过炼狱生活的幸存者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性格中非同寻常的大胆极大改变了第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笔下的幸存者形象。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以色列人与幸存者是不同的整体,他们是后者的恩人。因此后者被认为是“异类”,同无动于衷的、冷漠的本土以色列人相比,他们过着单调乏味、空虚、寄生和封闭的生活。

充满悖论的是,卢比无法继续自己的道路并获得财富。他救人的举动导致了痛苦并使人物关系复杂化。他想要钱,因此设计勒索德国医生——后者是他所救的小女孩的父亲,通过发布虚假药物公告来影响美军倾销剩余巧克力的价格。某种程度上,“巧克力交易”凸现了他生存的欲望。随着情节进展,读者注意到女孩的父亲正是霸占卢比叔叔房子的人。同时,跟他过从甚密的叔叔的女仆,现在做着流莺,是德国医生的仆人,又是盖世太保的支持者。这里,幸存者在战后欧洲的道德困境以尖锐的方式凸现。而战后欧洲不仅成为大屠杀幸存者人生瓦解的场所,也为他们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外在表现形式。



《巧克力交易》英文版



《特种部队》英文版

对受过重创的犹太人的价值失落产生负罪感,导致了幸存者的精神冲突,小说中摩迪克的死体现了这一点。摩迪克乃摩迪之友,一个能“美化世界”并给生命带来“力量与欢笑”的“伟大的人”。他“多愁善感”但有“人格分裂”倾向,一直保持对死难犹太同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则被证明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内向的摩迪在“混乱的世界”中感到无能为力,“甚至连鸟的歌唱都似乎是罪恶的帮凶”。诗化描述造就了这样一个世界:大屠杀的形而上学意义随处可见,因此,对摩迪来说,生存意味着要与谋杀者及其帮凶同流合污。此外,作者还描述了来自世界的敌意。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人们甚至怀疑卢比冒险从火中救出小女孩是为了“钱”或“出名”。甚至连自认有进取心和有想象力的卢比本人也说,“我来到这里是错误”。

摩迪死于精神探险的中途,或许这是他卸下过去包袱和现在压力的唯一方式。只有通过死亡,他才能保持在集中营那些极端日子里未曾消失的正直与诚实。相形之下,活着的卢比只能不停地寻找物质上的成功,而这一点直到小说结尾都悬而未决。结果,两位主人公都不能在后大屠杀时代的欧洲文化环境中承受过去所经历痛苦。作者或许在暗示,个人的创伤可能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才能被医治,至少是被缓解或转化。

作为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古里试图借助

上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纳粹主要头目之一艾赫曼(Adolf Eichmann)进行为期数月的公开审判,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的唯一一例死刑。艾赫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组织把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的中心人物,也是和欧洲犹太人领袖有直接联系的最高级别纳粹官员。二战结束时逃到阿根廷,1960年5月,以色列特工人员将艾赫曼秘密逮捕并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1962年5月31日艾赫曼被送上绞架。

“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大屠杀文学记忆

“艾赫曼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际、确立民族记忆方式与民族身份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土以色列人业已形成的大屠杀集体记忆形式。就意识形态而言,“艾赫曼审判”本身对本-古里安及其政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一方面,本-古里安试图通过审判使整个世界感到有责任支持惟一个犹太国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希望以色列人民能够了解大屠杀真相,尤其是要教育年轻一代。

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20世纪50年代希伯来文学如何反映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简要回顾。在后大屠杀时代,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话题讳莫如深,尤其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涉猎大屠杀题材的作家屈指可数。换句话说,在大屠杀历史结束后,以色列作家在反映与表述民族历史灾难时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首先人们对是否有合适的文学样式能反映大屠杀表示存疑。犹太世界一向推崇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里·维塞尔曾经的论断:描写奥斯威辛的小说,要么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要么写的就不是奥斯威辛。哲学家也有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名言。这在犹太世界里带有普遍性,导致作家在试图涉猎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心有疑虑。

其次,如何对大屠杀历史进行表述。有的学者曾提出,大屠杀文学是否只应限于对其过程做忠实记载;时间是否只限于1933年到1945年之间;对于个人或群体、对幸存者及其子女以及普通人是否有沉重压力;是讨论某一具体事件还是讨论人类总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文学很难界定。再次,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也对大屠杀文学写作产生一定制约:由于民族的、集体的或个体的一些禁忌,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成了真正的囚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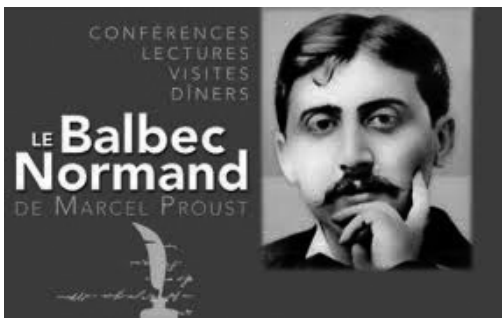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便遭到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围攻,本-古里安政府欲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把犹太复国主义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注重强调以华沙起义、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英雄主义精神,因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

天涯异草

卡堡(Cabourg)位于法国芒什海峡“花岸”,在迪沃河入海口,18世纪末还是个荒僻的小渔村,今日已成为一座古希腊剧场风格、呈扇形辐射的袖珍花园城市,被誉为“海滩女王”,保留着上世纪“美好时代”温润浴场的特征。早在1066年,诺曼底公爵吉约姆——英国人称“威廉”——率舰队从这里伺机乘舟渡越芒什海峡,登陆英伦三岛,在哈斯廷一役打败哈罗德二世,夺取了他的英王宝座。史称的“征服者吉约姆”,给卡堡留下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文化渊源,在其城建艺术上也有反映,城厢尚有个“吉约姆港”和“征服者吉约姆村”,后者为一古董集散地。

“卡西诺花园”在市中心,游人眼见的豪华官殿式建筑是始建于1862年的“大旅馆”,门前一块牌匾上摘录着玛塞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章节。近前细看,那是该小说第二部《如花少女倩影下》的片段,记载作者下榻“大旅馆”的印象,说他一开始对之颇有恶感,待久了才逐渐消除。玛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里兹”大酒店,自1907年至1914年,每逢夏天就到卡堡避暑和疗养哮喘病,住在“大旅馆”写自传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此外因而添上了名作家的光彩,吸引远方的文学爱好者前来,瞻仰当年玛塞尔·普鲁斯特的卧房和从玻璃门窗能眺望大海的餐厅。这里的城邦联合国“家”还成了“玛塞尔·普鲁斯特”文学奖评委开会的地方。

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卡堡被作者易名为“巴培克”,但“大旅馆”保留了原名。由“大旅馆”一侧的“海洋林荫道”前行,约莫5分钟就到了海滩,上边有近4公里的沿海长堤,筑于1887年。起初目的在保护海边的漂亮别墅不受巨浪冲击侵蚀,且定名为“皇后大路”,或曰“英国人散步道”。大道很快向东西两边延伸,达到1800米,蔚为壮观。在荒蛮沙丘山筑造卡堡的杜朗·莫兰波曾于1854年预



卡堡与普鲁斯特有关的旅游招贴画

言,卡堡的沙滩是法国最美的,与近旁的诺曼底“泻日”幽谷相配。在卡堡的自然环境中,海岸长堤无疑是一张“王牌”。现今,它更名为“玛塞尔·普鲁斯特散步道”,则显得更为浪漫。

玛塞尔·普鲁斯特在卡堡栖身的岁月里,经常到这条沿海长堤上闲步。面对绿堤、苍海、蓝天,他触景生情,不禁回忆起自己在家乡贡柏莱曾有过的感情纠葛,继续写出往昔的苦涩悲欢。他摆脱宇宙时空的规律,通过艺术挖掘深埋于潜意识中的真实要素,竭力追回令人感慨的似水流年。找寻逝去的时光,遂成为他小说的基本文学修辞格,借以描绘一个没落贵族和布尔乔亚窄小生活天地的意象。

玛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七部,即他死后才面世的小说最后篇章里嗟叹:“真正的天堂,乃是人们失去的天堂”。想当年,他来到卡堡,在寂寥的沿海堤岸大道上重踏前尘,找回昔日的天堂。他深受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拉斯金的美学观影响,又怀着叔本华的几分悲情,企望“失乐园”里诸如画家埃勒蒂斯、音乐家万德奕和作家贝尔葛特,尤其是阿尔贝蒂娜等一系列故人在潜意识的本能回忆中重现光芒。这些一度十分时髦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里皆有原型:有的



玛塞尔·普鲁斯特散步道

就是他在卡堡“大旅馆”里冷眼观察到的法国封建贵族遗老,或者在市内“卡西诺”赌场相遇的纨绔,曾经觥筹交错,妙曼歌舞。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初到巴黎就听塞古尔学院院长埃·罗布莱斯说过,小说里的女郎阿尔贝蒂娜确有其人,实际上是一位男士,名叫阿尔弗莱德·阿克斯蒂奈利,即给普鲁斯特开车兼当秘书的亲密“同志”,因不堪普氏的纠缠而逃遁,不久从昂蒂布上空坠机,并非像小说里阿尔贝蒂娜那样坠马身亡。当然,如果普鲁斯特的小说为“正传”,那么罗布莱

斯所传就归“稗史”了。

走在“玛塞尔·普鲁斯特散步道”上,笔者的神思回转到在脚下堤岸留名的普鲁斯特,思考逝者的文学生涯及其影响。今年是小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发表100周年。这部书现在被捧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主要里程碑”,在当代散文的“创世纪”中“同亨利·詹姆斯和詹姆斯·乔伊斯作品并列”,可当时并不被看好。1913年,普鲁斯特“闭门造车”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交给伽利马尔出版社,不幸遭遇退稿。拒绝出版者是极具影响的作家安德烈·纪德。普鲁斯特遂转向格拉塞出版社,在那边自费印行了小说的第一部《斯旺家那边》。整部《追忆似水年华》到1922年作者辞世后才得以问世,故当代

□沈大力

文论家米歇尔·施奈德不无幽默地说:“普鲁斯特一生下来,就像他笔下的人物贝葛特一样永远死去了”。可以说,普鲁斯特在法国文坛“复活”,确是身后之事。

据学术界评论,普鲁斯特的文学业绩在于他首次将“内心独白”即“意识流”引进文学创作,开拓了现代派文学的途径。然而,这一评价并不那么确切。在法国文学史上,作为“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并非是他独创,更不是首创。比他早数十年,法国作家茹尔·瓦莱斯就在其自传三部曲《孩提》《高中毕业生》和《起义》里灵活生动地运用了此种写作手法,在法国文坛为“意识流”开闸。至于说普鲁斯特的论文《驳圣佩韦》是打破巴尔扎克传统、开拓现代派文学的“宣言”,也并非无可质疑。巴尔扎克远未被普鲁斯特挥动笔杆子推倒,而所谓现代派文学虽然呼声高昂,但愈来愈缺少文学性,并无多强的生命力。再者,在当代社会里,阅读巴尔扎克的读者远远超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笔者久居巴黎,跟不少文学界人士接触,发现每谈及文学时,在行或不在行者言必称玛塞尔·普鲁斯特,但真正静坐下来研读2400页《追忆似水年华》者,却寥若晨星。何况,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来去匆匆的人没有工夫,更无耐心忍受普氏长得奇异的“流水账”语句。为普鲁斯特第一部诗集《乐趣与岁月》作序的法兰士就曾言:“生命苦短,而普鲁斯特过长”。且看,他在小说里提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达2360次,斯旺1643次,他眷恋的母亲1395次,犯了法国读者厌烦重复的大忌。事实表明,对他文学贡献的评价,似有“过誉”之嫌。法国文论家弗朗索瓦·蓬最近还在塞伊出版社推出一部探罗普氏迷津的专著,题为《普鲁斯特,一个虚构》。米歇尔·施奈德在今年8月下旬的《方位》杂志上撰写《玛塞尔·普鲁斯特最后的秘密》一文,试图为《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解疑,先设问“普鲁斯特为何人?他是一盏

丰富的想象力来再现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的战争创伤。摩迪在战争期间不得不中止了他在战前即已开始的博士课程,导师认为他的工作值得尊重并对所做的课题有贡献,还把他藏到了自己兄弟的修道院中。他在“最隐蔽的和被人忽略的地下室小房间”里承受着黑暗、沉寂、孤独和消沉。教授的忠实兄弟是惟一来看望他、并陪他在星光下散步的人。由于远离活生生的世界,他与其他被困于集中营的犹太受害者有共同的丧失身份的经历。身份重建引发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来自何方,我居于何处,以及在异化的世界里将走向哪里等等。他的寻找身份之旅以看不到未来作结。此外,他的恩师因他之故被判刑并失去记忆,这不仅加重了他的罪恶感,而且凸现了他对未来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古里所塑造的主人公命运暗喻着作家本人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毁灭经历的认同和他对犹太人命运的依恋。

《特种部队》:充满矛盾地同幸存者建构联系

另外一位通过把小说背景置于欧洲而建立了本土以色列人与欧洲犹太人联系的作品是哈努赫·巴拉夫。他于1926年生于一个宗教之家,在二战中曾在犹太旅中服役。根据在欧洲的经历,巴拉夫于1965出版了小说《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是一部半自传体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叙述人同时也是主人公的艾力沙·克鲁克是18岁的本土以色列人。艾力沙被编入了英国军队中的巴勒斯坦团。像其他以色列年轻人一样,他希望积极地投身到反抗民族敌人的斗争中去。但当他们的连队刚刚抵达意大利,还没有跟德国军队交火时,纳粹就宣布投降,因而小说从战争结束写起。小说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艾力沙苦苦思念青梅竹马的女友诺佳并产生焦虑,而后者对他并不忠贞,还差点在他在欧洲期间另嫁他人;另一条是他同幸存者和迫害者在历经战乱的欧洲废墟上相遇,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逐渐认知。后者导致了他真诚的灵魂探索:一方面是作为本土生长以色列人的个体意识和少年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于民族创伤及其后果的新理解在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在以色列希伯来人和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的直接联系中展现出来。

以色列希伯来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同各式各样难民的相遇中获得了意义。例如,他们遇到一群来自劳动营的虔诚的匈牙利裁缝,后者在安息日餐桌上唱着传统的关于弥赛亚降临和重返“应许之地”的赞美诗。一种对于民族创伤及其后果的新理解在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在以色列希伯来人和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的直接联系中展现出来。以色列希伯来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同各式各样难民的相遇中获得了意义。例如,他们遇到一群来自劳动营的虔诚的匈牙利裁缝,后者在安息日餐桌上唱着传统的关于弥赛亚降临和重返“应许之地”的赞美诗。一种对于民族创伤及其后果的新理解在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在以色列希伯来人和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的直接联系中展现出来。

总之,“艾赫曼审判”是以色列社会重新建构大屠杀记忆的转折点。许多个体作家对审判极其关注,并对种族灭绝的体验反映强烈。古里与巴拉夫等在审判前就和幸存者接触过本土以色列作家,试图在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中重建同大屠杀幸存者内心世界的联系。两部作品均与大屠杀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经验无关,但不管怎样,大屠杀事件在“艾赫曼审判”后成为以色列作家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而犹太人的历史创伤成为本土以色列人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

灯,还是一件外套?一个虚构,还是一个怪癖?”答案应该是:几方面兼而有之。总之,正如施奈德所说,玛塞尔·普鲁斯特变成了一个“名称”。

不论“空名”,还是“虚名”,它于1956年代替了卡堡海岸大道原有的“英国人散步道”称谓,表明人们可以随意借用。笔者在漫步那天,市内正举办卡西诺赌场庆祝10周年的空前盛筵。卡西诺赌场老板选址在“普鲁斯特散步道”摆阔,更多是想借《追忆似水年华》作者的名人效应。至于酒席间有多少人真会忆及普鲁斯特,则另当别论。

玛塞尔·普鲁斯特最初给他的“意识流”杰作取过4个不同的书名,曰:《往昔乳石》《绿锈映像》《以往的探访者》和《绵延的过去》,最后确定为现名《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出版100周年,巴黎秋天的文学季也将之列之为“盛事”,予以纪念。为赶上这个文学季的重点,崇拜《追忆似水年华》作者的安托万父子合编了一部《玛塞尔·普鲁斯特密典》,被视为普鲁斯特的读者大全,各人尽可各取所需,足够从中采摘英华者成为著名学者,走上大学教授讲坛,仅那一小块作为“圣体”的玛德莱娜蛋糕和斯旺在一盏绿罩“阿拉丁神灯”的微光里看见黛黛特一景,就玄之又玄,可大书特书。可惜,1984年什洛多夫执导的法德合拍影片《斯旺的爱情》遭人喝倒彩,没能让普鲁斯特如愿找回他的逝水流年。

普鲁斯特是个十足的怀旧人物,而今却被封为“现代派”,他一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现在反倒成了时髦的装饰。依笔者所观,目下卡堡这座普鲁斯特“拥趸”都来朝圣的“麦加”,并非真依靠他的“精神”,而更重视物质发展。

离开“玛塞尔·普鲁斯特散步道”川流不息的游客群时,笔者不无遗憾地感到,《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已全然不是人们的谈资。至多,此君像他在塞纳河右岸的同时代文人让·高科多所见的,是一只玻璃水族缸里的“章鱼”,或者詹姆斯眼中的“幽灵”。